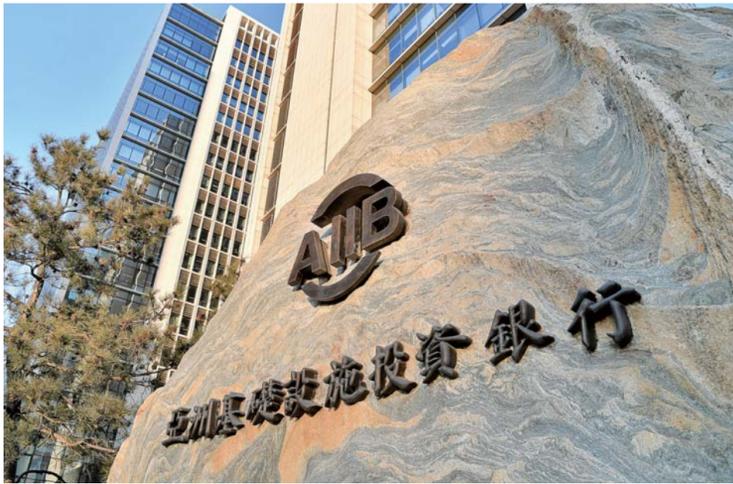




两会解读：金融业开放进入全新阶段



▲这是位于北京金融街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总部大楼前的石碑(1月12日摄)。新华社记者李鑫摄

续五年位居榜首。

“金融体系发展成熟是金融领域开放的重要条件,经过多年发展,我国银行业总体上有能力也有条件迎接更深层次的开放。”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高级研究员董希淼表示。

朱隽表示,我国金融业对外开放的经验之一就是中国金融市场容量足够大,中国金融机构实力足够强劲,完全可以应对外资金融机构的竞争。

加强金融监管迎接开放新阶段

扩大对外开放已经成为共识。金融业是经营风险的特殊行业,金融业开放既可以带来效率的改善,也可能加大资本的流动,增加金融市场的不稳定性,这就要求金融业的开放与金融监管能力的提升相辅相成。

“放宽或取消外资一些持股比例限制,体现了内外资一视同仁,并不意味着放松监管。外资金融机构要准入或开展业务,依然要按照相关法规进行审慎监管,有效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维护金融稳定。”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易纲表示。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副院长黄益平表示,要完善与开放金融体系相匹配的宏观审慎监管框架,有效预防并化解在金融开放过程中可能遭遇的各种风险,特别是跨境资本流动风险。

事实上,我国已经在为金融业的进一步对外开放做好制度上的安排。设立国务院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央行实施宏观审慎评估体系(MPA),更多金融活动和金融行为纳入管理;根据提请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审议的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将组建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

专家认为,一系列的制度安排必将为扩大开放后加强金融监管提供有力保障,确保金融业在对外开放中稳步前行,推动我国由金融大国向金融强国转变。

“要使我们的监管水平和开放程度相适应,在开放中防范好风险,使得中国的居民和全世界的投资者在中国市场上更加便利,配置资源的效率更高。”易纲说。

新华社北京电(记者赵晓辉、李延霞)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扩大金融业对外开放是我国对外开放的重要方面。

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提出,有序开放银行卡清算等市场,放开外资保险经纪公司经营范围限制,放宽或取消银行、证券、基金管理、期货、金融资产管理公司等外资股比限制,统一中外资银行市场准入标准。

业界认为,这些大力度举措标志着我国金融业对外开放正在进入全新阶段,必将助推我国金融业做大做强。

释放金融业对外开放积极信号

实际上,2017年以来,我国不断释放出进一步扩大金融业对外开放的信号。

去年11月,作为中美元首会晤达成的一项重要共识,中方按照自己扩大开放的时间表和路线图,将大幅度放宽金融业,包括银行业、证券基金业和保险业的准入。

在此后的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财政部副部长朱光耀详细介绍了中国将在金融业开放上采取的具体举措,包括将单个或多个外国投资者直接或间接投资证券、基金管理、期货公司的投资比例限制放宽至51%,取消对中外资银行和金融资产管理公司的外资单一持股不超过20%、合计持股不超过25%的持股比例限制等。

针对这些安排,相关部门已经在行动。中国证监会近日表示,拟修订《外资参股证券公司设立规则》,拟以《外商投资证券公司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重新发布。修改内容包括:允许外资控股合资证券公司,统一外资持有上市和非上市两类证券公司股权的比例,逐步放开合资证券公司业务范围,放宽单个境外投资者持有上市证券公司股份的比例限制。

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在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记者会上表示,应该说市场准入方面的对外开放准备了很多年,我们进入新的阶段后,确实在这方面可以胆子大一些,开放的程度更高一些。

他认为,人民币国际化、金融市场对外开放等意味着中国在货币可兑换方面逐渐迈出坚实稳定的步伐。预计这种开放的趋势还会继续加

大。“从政策上讲,多数该研究的政策都已经研究过,逐步寻找时机稳步向前推进。”

我国金融业在开放中成长

回顾过去多年,随着我国在全球经济地位的提升,金融业对外开放不断扩大,在金融机构与金融市场开放、完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人民币国际化等方面取得长足进展。

以银行业为例,2017年末外资银行在中国营业性机构总数1013家,相比2002年的180家年均增长13%;总资产从2002年末的3000多亿元,增长到2017年末的3.24万亿元,年均增长超过15%;2017年累计实现净利润相当于2002年的10倍。

沪港通、深港通、债券通相继开通实施,资本项目下的开放稳步有序推进,人民币跻身国际储备货币,中国已经成为世界金融大国。

代表委员支招家政业如何让生活更美好

进一步解决供需矛盾,破解“成长的烦恼”,做实做好这项爱心事业

28岁的李明纯是一位生活在成都的新晋妈妈。儿子出生半年以来,她没少跟家政打交道:“月嫂、育婴师都是精挑细选,生怕中途闪人。请钟点清洁工、做饭阿姨相对容易,但称心如意也意味着价格不菲……”

对城市中新的青年一代来说,家政服务人员已经是“生活之友”,以常住人口1600万的成都市为例,截至2017年12月底,全市有家政服务企业1400余家,从业人员38万人。家政服务业发展迅猛,已成朝阳产业。

“朝阳”冉冉升起

成都市妇联女性就业中心主任、成都家政服务员协会会长刘卿表示,近20年来,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家政服务业经历了巨大变化。

“过去人们选择这一职业,大多是迫于无奈,从业人员普遍年龄偏大、文化素质不高,有相当大的比例是下岗工人。现在的主力军是农村外出务工人员。随着职业教育的普及,技校、职高毕业生也开始主动进入这一领域。”刘卿说。

作为国家“百城万村”家政扶贫试点单位,3月9日上午,成都三六零母婴家庭服务有限公司在四川省达州市宣汉县进行了一次宣讲。“现场来了400多人,50多人意向登记,20多人现场签约。”公司负责人奉辉介

也有“成长的烦恼”

作为朝阳产业,家政业既可以满足城市家庭育儿养老的现实需求,又可以满足进城务工人员就业需求。但要想把这项互利共赢的爱心事业做实做好,还需要进一步解决好供需矛盾。

记者调查发现,供需矛盾突出、服务质量参差不齐、行业标准和制度滞后是当前家政业面临的共同难题。

“技术要求处于低端的保姆、钟点服务呈现出雇主要求高、服务品质低的特点;技术要求处于中端的老人、病人、母婴护理等服务项目供不应求;技术要求处于高端的家庭管

家、家庭理财、家庭保健等服务领域,缺乏专业人员和队伍。”成都市家政行业协会会长王小兵说。

全国政协委员、宁夏社科院社会学法学研究所所长李保平认为,管理不规范也是制约行业发展的重要因素。虽然2013年有关部门就出台了管理办法,但部门规章的规范作用有限,标准缺乏强制性。

除了行业自身的瓶颈制约,外部环境也给家政业发展带来压力。“近年来,随着一些负面事件先后被曝光,行业有被‘污名化’的现象,一些雇主缺乏对家政服务员的起码信任和尊重,给从业人员的职业认同感造成了负面影响。”刘卿说。

还有业内人士指出,家政服务业流动性大,相关保障也不完备,很多家政服务员的社保都是自己解决。

办成爱心工程

针对体系和标准不完善、不配套的问题,李保平建议以行政法规形式出台相关管理办法,如“家庭服务业管理条例”,以此推动地方立法进程;同时还要充分发挥行业协会的作用,支持行业协会制定行业标准加强自律。他还建议,要加快推进家庭服务业标准化体系建设,推动国家标准、地方标准、行业标准建设,规范市场秩序和市场主体行为。

针对行业安全风险问题,一些代表建议相关部门探索构建从业人员注册机制和信用追溯体系。这将有助于客户客观了解家政服务机构和从业人员的信用状况,有效防范事故和纠纷,确保行业健康运行。

针对从业人员培训问题,全国人大代表、四川大学教授里赞认为,育婴、老年护理等技术要求较高的家政服务,可以尝试开展由政府、高校和专业机构三方共同培养的模式,通过专业化、系统化学习向社会输出高素质人才。

为切实提升培训的质量,里赞建议参照医护人员和教师的职称模式,对不同等级资格的护理人员分类制定专业培养方案,如可设置生活照护培训、医疗照护培训、康复保健培训、心理健康指导培训等不同类别,提升其专业化水平,打通职业晋升渠道,充分拓展家政服务人员职业发展空间。

要把“朝阳产业”办成“爱心工程”,还离不开政策支持。一些代表委员建议,对家政服务业给予优惠政策,方便企业在小区设点服务,解决家政服务“最后一公里”问题,同时考虑对相关企业提供税收减免,鼓励微利经营的家政企业加快发展。

(采写记者:吴光于、叶含勇、任玮、王阳) 新华社北京电

尽管我国一些制造领域芯片“瓶颈”制约正在缓解,但大量进口的现状还没有根本改变

代表委员建言破解『中国芯』发展瓶颈

芯片,被誉为是高端制造业的“皇冠明珠”,是一个国家制造业和科技实力的象征。

近年来,尽管我国一些制造领域芯片“瓶颈”制约正在缓解,但每年依然要依赖大量进口。

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加快制造强国建设,并部署推动集成电路、第五代移动通信等产业发展。如何从根本上破解芯片“瓶颈”,代表委员和业内人士纷纷建言献策。

芯片制约有所缓解,大量进口现状依然未变

很长时间内,类似“圆珠笔尖”的核心零部件一度缺失,手机摄像头以国外厂商为主,内存条价格受市场波动大……芯片成为制约我国制造领域发展的“瓶颈”。

令人欣慰的是,经过多年投入,这一问题在逐渐得到缓解:“核高基”专项与国外差距由15年以上缩短到5年,一批核心电子器件长期依赖进口的“卡脖子”问题得到缓解,人工智能芯片领域中一些中国企业正在展现全球水平……

“我和我的团队承担了国家‘星光中国芯工程’,我们自主研发的芯片成功占领全球计算机图像输入芯片约60%的市场。”全国政协委员、“星光中国芯工程”总指挥邓中翰说。

芯片产业发展与国家的重视和投入密不可分。2014年以来,我国相继出台了《国家集成电路产业发展推进纲要》,成立国家集成电路产业投资基金,加大集成电路产业投资布局,集成电路自给率大幅提高,有效缓解了制约。

“为什么现在感觉到技术创新突围扑面而来,主要是信息技术科技创新能力集体突围,一些技术爆炸式变化,制造业自动化、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快速发展。”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电子学会秘书长徐晓兰说。

邓中翰说,尽管我国在集成电路产业部分领域已取得突破,但整体还落后不少。“芯片大量进口的现状,还没有发生根本性改变。”

核心技术“命门”要守好,没有芯片就没有信息安全

核心技术和芯片是各类智能信息系统的“命门”。尽管在不少产品上已有国产芯片,但高端芯片或装备依然很少见。

“集成电路是战略性产业,一旦放松就会错过几十年,我们必须高度重视,实现跨越。”邓中翰说。若核心技术受制于人,将对我国信息安全造成隐患。

在全国人大代表、TCL集团董事长李东生看来,中国在关键领域和核心技术上投入较晚,而欧美、日本、韩国企业经过几十年的技术积累,已经基本把芯片设计的核心技术掌握在手中,并建立了垄断态势,为我们在一些核心技术上“弯道超车”带来挑战。

制约产业发展的一个重要原因是缺人。此外,企业面临的融资难融资贵问题导致科技企业创新成本高,加上一些重大专项基金更多停留在研发机构,很难进入到创新的中小企业中,这些都成为制约企业创新的瓶颈。

人工智能时代更须抓住机遇,努力追赶力争“弯道超车”

芯片也被誉为一个国家的“工业粮草”。代表委员们认为,人工智能时代,芯片作为信息系统“大脑”和“魂”的作用更加凸显,提前布局,我们有望实现“弯道超车”。

赛迪研究院互联网研究所副所长陆峰建议,随着人工智能时代到来,应在网络平台和大数据应用比较集中活跃的电子商务、社交网络、智能制造、医疗卫生、交通出行等若干领域,依托用户和数据规模优势,率先加强人工智能芯片的研发和创新应用。

他认为,要用好政策和市场两把“利剑”,推进核心技术、零部件集中攻关和产业化应用。科研创新应避免“撒胡椒粉”式的支持,重点加大对核心技术创新应用的政策扶持。

邓中翰表示,未来一方面要利用人才、资金和政策等方面优势,沿着国外成熟的发展路线,努力在局部领域实现超越。同时,要充分发挥国内市场广阔的优势,在一些领域围绕自主标准、知识产权研发芯片,构建新的产业模式和生态链,力争实现“弯道超车”。

“中国芯片产业应与世界深度融合。”李东生说,比如借助国家“一带一路”倡议,加快与沿线国家的创新合作。目前,TCL就准备与“一带一路”沿线的以色列等国进行技术引进和创新合作。

(记者于佳欣、张辛欣、潘洁)新华社北京电